

第一编 素质教育的渊源与发展

“素质教育”，这个概念以专有名称提出的时间并不长，最早见于 1985 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，而后由华中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正式提出。但是，有关素质教育的内容或论述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，并在各个不同时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观念和体系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以孔子为首创立的儒家学派以及以其代表的诸子百家，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“教化”问题。如在人性起源问题上，孟子提倡“性善说”，荀子提倡“性恶说”，从学术争论上可谓背道而驰，针锋相对。但他们的共同点都主张“教化”。孟子是要通过教化使人保持并发扬人的“善性”；荀子则是通过教化使人克服摒弃“恶性”，逐步归化到“善”的方面来，以达到“尽善尽美”的境界。从这点上说，处于同一时期的儒法两家代表人物的观点，可谓是殊途同归。这期间，孟子有著名的“修身说”，荀子则有著名的《劝学》篇。

综观春秋战国以来关于“教化”的论述，儒家经典可谓最典型也最具代表性。自汉代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上疏被实行以来，儒家的“教化”理论一直居于统治地位，并以儒家文化为基础，构筑了几千年中华传统

文化体系。自唐代韩愈、柳宗元倡导文学复古以来，儒家地位日益显著，特别是到了宋代的程颢、程颐和朱熹，更是将孔孟儒家学说经典化、理学化，使儒家学说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从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驾驭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工具，并几乎替代了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。而儒家所倡导的“教化”，究其底就是“素质教育”（不完全意义的素质教育）其重心在于伦理道德教育，即强调修身养性，做一个至仁、至义、至礼、至智、至信的尽善尽美的完人。虽然，儒家提倡修身养性，在方法上过分苛求克己戒欲，过分强调尊卑贵贱，但其要求人们讲道德，明礼义，长知识，图进取的精神，今天仍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借鉴作用。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其反帝反封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，在中华大地炸响了一声宏亮的春雷。在文学上，“五四”提倡白话文运动，使文学为少数人服务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；在思想领域，“五四”高举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旗帜，提出反传统，倡导用“德先生”、“赛先生”（即民主科学）取代封建独裁制度与封建迷信思想。以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郭沫若等为代表的民主斗士，一方面以自己犀利的笔触，无情地鞭挞封建制度的罪恶，唤起人们精神的觉醒与行动的反抗；另一方面又大声疾呼对国民的教育，提出走教育救国的道路，以期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，以教育增强民族的素质，解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，不再受世界列强的掠夺与欺凌。

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

对帝国主义的封锁与颠覆，着手进行了两项重大改革，即土地改革与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。与此同时，也把加强和发展教育做为建国以后的头等大事，在农村、在城市广泛开展识字运动、扫盲运动，在学校，大力提倡“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”。毛泽东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：“我们的教育方针，应该使受教育者，在德育、智育、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，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。”尽管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动乱期间，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与无情迫害，教育工作遭受了极大的破坏，但“又红又专”的口号却始终没有放弃。而且，这期间，为了工作的需要，除学校教育外，有时还举办过一些诸如财会、水利测量、农机、农技等方面的短期培训班。当然，建国以来到“文革”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总的说是举步维艰，曲折多变的，但其提出的一些教育观点至今仍在沿用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党和政府对教育给予了空前的重视。继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，各级各类学校迅猛发展，办学规模日益扩大。随着教育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日益突出的地位，人们对教育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刻，“素质教育”理论也由此应运而生，呼之而出。早在 1985 年 5 月 19 日，邓小平同志就率先提出了“素质教育”这一全新的教育理念。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：“我们国家，国力的强弱，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，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，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与质量。”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。现在这么多青年

人犯罪，无法无天，没有顾忌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。所以，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，根本问题是教育人。”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“素质教育”工作，他多次强调教育的战略地位与作用，强调提高国民素质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。在党的十五大上，江泽民同志指出：“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与人力资源的开发；…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，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公民。”此间，党和国家密切关注教育的发展和“素质教育”工程，颁发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指导“素质教育”工作，并逐步将“素质教育”思想理论化、系统化和可操作化，形成了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新理念。

第一章 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 古代素质教育观—— 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

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体，其中必然会存在不少糟粕，但也应该肯定，其中也必定会有不少凝聚着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精华。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，主要是对儒家文化的扬弃，这就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正确的定位和取舍，以剔除其糟粕，吸取其精华。在儒家文化中，“教化”民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。提高君、臣、士、庶人的道德素质，始终是儒家学者们毕生探索宣传、孜孜以求的精要所在。虽然我们多年来一直将儒家封建礼教视为批判的重点，但不应否认，其“教化”理论在教育大家讲道德、明礼义、求知识、敬老助幼、安定社会等思想，无疑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五千年香火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，这是不容置疑的，也是不容抹煞的。应该肯定，儒家文化关于“教化”民众的教育思想，至今仍闪耀着不朽的光辉，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一、儒家“教化”理论的缘起及其主要论述

在汗牛充栋的儒家学说典籍中，最具经典性和代表性者当首推《四书》。在《四书》中，关于“教化”的思想

与论述比比皆是，这应视为在古代中国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素质教育。

《大学》本属《礼记》中之一篇，宋代程颐认为乃孔子遗作，后儒家集大成者朱熹承其说，将《大学》取出独立成篇，做为引导教育人们进入道德之门的第一书，可称之为我国古代德育教育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。

《大学》的基本思想，是从德化的角度教育统治阶级治理百姓，治理国家，是儒家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学说。其中心内容体现在诚、仁二字，强调明德与慎独，要求做人的准则在于表里一致。

如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”“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修身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（《大学》传文第一章）

“所谓诚真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掩其不善，而著其善，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盖矣？此谓诚于中，形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：‘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！’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，故君子心诚其意。（《大学》传文第六章）“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《康诰》曰：‘如保赤

子。’” “一家仁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；其机如此。此谓一言偾事，一人定国。”

“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”（《大学》传文第九章）“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，上老老，而民兴孝；上长长，而民兴弟；上恤孤，而民不倍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；此之谓絜矩之道”。

（《大学》传文第十章）所有这些，指出有大作为者学习的道理，首要的任务是净化自己光明的德性，净化自己的心灵，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榜样，去感化和教育普通民众，让广大民众学会做人的道理和基本的礼节，尊敬老人长者，爱抚幼小孤弱，憎恶明确对象而不加祸旁人，从而达到善的最高境界。只有这样推己及人，就能使人人树立远大理想，遵守社会秩序，坚定良好修养的信念，明确了解事物真缔与变化规律的奋斗方向，做到家庭和睦，社会安定，天下大同。

《中庸》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，宋代朱熹将其从《小戴·礼记》中抽出独立成书，做为儒家学者进行自我修养的基本课程。它反复强调加强修养，坚持本质，坚持正义，为孟子创立的义利观提供了理论基础。如“子曰：‘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！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；善述人之事者也。’”（《中庸》第十九章）“故为政在人，取人在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。义

者，宜也，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；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

曰：‘君臣也；父子也；夫妇也；昆弟也；朋友之交也。’五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‘知、仁、勇’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”子曰：“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”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有弗学，学之弗能弗措也；有弗问，问之弗知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笃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”（《中庸》第二十章）

“唯天下至圣，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”（《中庸》第三十一章）

《论语》是记载孔子与学生对话及其言行的典籍。就篇章结构而言，《论语》是语录体裁，但就其思想内容而言，《论语》是教诲人们学习、修身、明德、明礼的一种重要的儒学教科书。其中关于学习与教化的内容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如：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（《学而》（1））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（《学而》（4））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

者 过则勿惮改。(《学而》(8))子贡曰：“贫而不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(《学而》(15))子曰：“不患人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(《学而》(16))。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(《为政》(15))子曰：“由！诲女，知之乎！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(《为政》(17))

“昔有子贡问孔子曰：‘夫子圣矣乎？’孔子曰：‘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！’”(《孟子·公孙丑》(2))

“子曰：‘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’”(《卫灵公》(31)) “孔子曰：‘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’”(《季氏》(9)) “孔子曰：‘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’”(《季氏》(90)) 这些都是记载孔子对学习的态度。而孔子对人格的完美有着很高的要求，即从智慧、廉洁、刚毅、才能与道德礼节等方面要求完美结合。如：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“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成人矣。”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，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成人矣。”(《宪问》(12)) 而孔子更以自己的言行对其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，如：“乡人饮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。”升车，必正立，执绥。车中，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。”(《乡党》(13.18)) “师冕见(乐师冕为盲人)，及阶，子曰：‘阶也’。及席，子曰：‘席也。’皆坐，子告之曰：‘某在

斯，某在斯。’师冕出。子张问曰：‘与师言之道与？’子曰：‘然，固相师之道也。’”(《卫灵公》(42))孟子曰：“孔子之去鲁，曰‘迟迟吾行也。’去父母国之道也。去齐，接淅而行。去他国之道也。”(《孟子·尽心》(17))

孔子主张对人的教化，要有一定的生活条件为保障，可根据人的特性来进行不同方式的教育。“子适卫，冉有仆。子曰：‘庶矣哉！’冉有曰：‘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’曰：‘富之。’曰：‘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’曰：‘教之。’”(《子路》(9))“子曰：‘有教无类。’”(《卫灵公》(39))孔子对于教化，认为必先从统治者开始，并由统治者亲自实施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坚持不懈，方可达到教化民众的效果。“子曰：‘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’”(《子路》(13))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‘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’”(《子路》(19))“子曰：‘当仁，不让于师。’”“君子贞而不谅。”(《卫灵公》(36.37))做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，孔子对于交友、侍君、从政等都有其深刻的见解。他经常教导学生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盖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“益者三乐，损者三乐。乐节礼乐，乐道人之善，乐多贤友，益矣。乐骄乐，乐逸游，乐宴乐，损矣。”“侍于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。”(《季氏》(4.5.6))“巧言乱德，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”(《卫灵公》(27))“孔子曰：‘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

斗及其老也 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”（《季氏》（7））
“所重：民，食，丧祭。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公则说。”“子张问于孔子曰：‘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’子曰：‘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’子张曰：‘何谓五美？’子曰：‘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’子张曰：‘何谓惠而不费？’子曰：‘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其不亦惠而不费乎？择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贪？君子无时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！’子张曰：‘何谓四恶？’子曰：‘不教而杀谓之虐；不戒视成谓之暴；慢令致期谓之贼；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吝谓之有司。’”（《尧而》（1）（2））由此可见，孔子要求统治者要行仁政，取信于民，做到以教化之，以德晓之，以信取之，以行率之，以法律之，不好人喜功，不贪财压众。这些对我们当前的行政工作者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。

《孟子》是记载儒家学派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尊为亚圣的孟轲言行的专辑，其论述不仅对孔子的言论观点进行了具体化的阐述，主要是开导统治阶级要把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做为施政的标准，实行“王道”。其观点主要体现了“重民”、“重天（生态）”、“重气节”的思想。虽然他所推崇的是“先王之道”，但对于人才的拔擢，他也主张不拘一格，德才兼备。他认为人才的成长一定要经过挫折磨难教育，才能具备坚定不移、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毅力，才能成就其远大的志向和理想。

“孟子曰：‘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’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（14））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，天可运于掌。”“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权，然后知轻重；度，然后知长短。物皆然，心为甚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（7））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数罟不入洿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（3））“孟子曰：‘离娄之明，公输子之巧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；师旷之聪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；尧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’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（1））“景春曰：‘公孙衍、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？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熄。’孟子曰：‘是焉得为大丈夫乎？子未学礼乎？丈夫之冠也，父命之；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，往送之门，戒之曰：往之女家，必敬必戒，无违夫子！以顺为正者，妾妇之道也。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；得志与民由之，不得志独行其道；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’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（2））“孟子曰：‘舜发于畎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之间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人恒过，然后能改；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；徵于色，发于声，而后喻。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

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。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。’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（15））对于教育，孟子主张教心，即从内心深处予以触动，他认为教育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，只要触动了人的心灵，教育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他说：“教亦多术矣，予不屑之教诲也者，是亦教诲之而已矣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（16））这个观点，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，确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提倡教化，强调教化的功用，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形成了共识。如道家用绝对辩证法的观点看待万事万物，则教导人们将世间一切看重，无为乃大。墨子主张仁爱平等，反对战争与一切暴力行为，因而教育人们要广施博爱。杨朱学说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，他的教育思想一切以“利我”为中心，故“拔一毛以利天下，非为也。”而法家则提倡以法治国，重典治乱，所以其教育思想始终围绕封建法制的建立而进行。亦儒亦法的荀子，在著名的《劝学》中强调“学，不可以已”。“干、越、夷、貉之子，生而同声，长而异俗，教使之然也。”提出了自我学习自我完善与社会教育的功能。如此种种，使我国古代关于教化的理论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，进而为儒家教化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先秦时期形成的诸子百家教育思想，自董仲舒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逐步演变合流为儒家一家的教育理论。由于其“先王道”“复古”思想的局限，尽管经过几千年的变迁，后世的儒家学者未敢也未能对孔孟教化理论予以创新或超越。虽然有唐代的韩愈《师说》提

出：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，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闻道也，固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。生乎吾后，其闻道也，亦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。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”打破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界线与尊卑贵贱的礼教等级。但和者稀落，终未自成体系。而北宋年间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之辈，只是将孔孟学说经典化、理学化，既没有对儒家教育思想发扬光大，反而使其沦为封建礼教束缚人们思维的精神桎梏。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悲哀，也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悲哀。

二、儒家“教化”理论的积极意义及其局限

综前所述，儒家的教育思想其中心内容是教育人们怎样做人，集中体现在尚德、明礼、增智、合义、取信等方面。这对安定社会，讲求德治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。而且，从先秦时期所处的历史条件来说，诸侯割据，以强凌弱，战争不断是当时最主要的历史特征，儒家学说则是站在约束封建统治者的修身的高度提出这些道德准则，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从施仁政，爱百姓这个立场出发的，尽管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并变为他们奴驭人们的理论工具，但其初衷应该是为维护广大民众利益的。因而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1. 儒家“教化”理论自始至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即明德、施仁、行义、明礼、增智、取信。不分尊卑贵

贱，无论士愚长幼，都必须遵守。不管是谁，只要违背了这些准则，儒家都会将其从受尊敬者名单中剔除。因而有对晋文、齐桓等成就霸业的君主，对夏桀、商纣等失去王位的君主，对管仲、张仪等“一怒而令诸侯惧”的权臣，对墨翟、杨朱等或广施博爱或一味利己之人，均取非议态度。即使对儒家中颇有成就之人，其评价也是严格按此标准进行，合者以褒，不合者以抑，绝无半点宽容。如对冉有、子路、告子等的评价，初看只似告诫，细察方知其苛。由此可见，儒家对人的评判，其标准是一致的，对“自己人”或许更为严厉，这也许是荀子被其排斥在儒家学派之外的根本原因。

2. 儒家“教化”推崇德治，是构建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，其真谛在于强调人与人、人与家庭、人与社会相互间的和谐协调，儒家讲求“中庸”，讲求“和为贵”，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诸侯割据，以强恃弱，社会纷乱的一种条件反射，也是儒家所向往并企求建立的理想社会模式。因此，儒家的“教化”理论在尊长爱幼、恤贫弱、反强暴等方面表现出了独到的精神气概。应该指出，在封建社会初期产生的儒家教化理论，其思想内容必定是与封建礼教紧密相连的，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。但是也不应否认，其要求人们讲求道德，遵守礼节，深明大义，学习知识，约束言行，获取他人与社会的信任，保持家庭和睦、社会安定，保证自身廉洁与个人名节，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，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今天，仍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

义。我们现在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其目的也是要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道德修养，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秩序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吸取了儒家教化理论的精华，剔除了其封建思想内容之糟粕，注入了社会主义新的思想内容。所以，儒家教化理论对于我们仍然具有借鉴意义。

3. 儒家教化理论是对封建统治者的一种有力约束。在儒家教化理论中，绝大多数是对封建统治者而言的，其中有些地方还专有所指。如要求封建统治者以自修为本，示范百姓；以亲民为本，爱护百姓。民欲舍之而必取之，民欲不舍而不强取；位高戒骄，年老戒贪；尊老爱幼，推己及人。等等。同时，阐明了民众、国家与君主之间的辩证关系，阐明了遵守自然发展规律的“天人合一”道理，提倡统治阶级应符合事物发展规律颁发禁令，以保护自然环境，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自然条件。可以想见，在封建统治下的特定历史时期，在生产力非常落后、人民温饱无着的条件下，提出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思想，提出“不违农时”；“数罟不入洿池”；“斧斤以时入山林”的思想，需要有多大的智慧和勇气。这些思想，即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，同样会闪闪发光。

4. 因历史条件的制约与人们认识的局限，儒家的教化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。一是教化的对象为封建统治者和儒家学者及子弟，没有涉及到广大民众，教化对象的层面很窄。二是教化的思想内容是封建的，保守的，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，没有

从根本上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。三是教化的内容局限于封建伦理道德方面，没有涉及自然科学与生产技艺。四是推崇“法先王”，一切以“古人的道德准则为标准，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分析事物与社会的发展，抹杀和否定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生事物。五是轻视劳苦大众，歧视妇女。如“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”六是封建礼教等级制度森严，宣扬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思想，乃至以后发展为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的“三纲五常”理论，对一切反抗统治阶级暴行的行为都被冠以“犯上作乱”的罪名，从而成为维系封建阶级统治的理论体系。